

丛 书 的 起 源

杨 世 文

丛书之名，起于唐宋，但丛书之实源于何时？学者一般认为宋人俞鼎孙《儒学警语》、左圭《百川学海》为近世丛书之源（参见《中国丛书综录·前言》）。笔者认为这是不确切的。丛书之实，早在六朝已具。丛书成编，实乃“统群书为一书”（叶德辉语），而冠以总名，总名下的每一部书又独立成部。根据这个原则，六朝时期出现的丛钞众书为一编，实开丛书之先河。如《隋书·经籍志》载葛洪有《史记钞》十四卷，《汉书钞》三十卷，《后汉书钞》三十卷，这三种书虽为节录原书，但合钞在一起，近似于后世的丛书。《隋志》又著录《三仓》三卷。《三仓》属于三书之总名，是合李斯《仓颉篇》、杨雄《训纂篇》及贾鲋《滂喜篇》而成。《隋志》又著录“司马相如《凡将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飞龙篇》、蔡邕《圣皇篇》《黄初篇》、《吴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则这八种书当合抄在一起，但不知有无总名。又《隋志》有梁任昉《杂传》一百四十七卷（按：《梁书·任昉传》作二百四十七卷），贺纵《杂传》七十卷，陆澄《杂传》十九卷，无名氏《杂传》十一卷。姚振宗谓“皆纂集先代别传汇为一帙者”（《汉书艺文志拾补》），并认为此乃丛书之滥觞。但无论《三仓》与《杂传》，所收集者实为单篇著作，与集众书成一部之丛书尚非一

事。

更近于丛书者为陆澄《地理书》。陆澄当世号为硕学。《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载陆书一百四十九卷，录一卷，“合《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可知该书集齐梁以前地记之大成。《隋志》又称该书“依前后远近编而为部”，可知编次亦甚有方。陆澄合一百六十家之书，而卷才一百四十九，知其中零杂短部必多。考其体例，有总名。而《录》一卷当即一百六十家之书名及作者，又其所集家数甚为清楚，则当保持原书之旧貌，未加重编，唯将原书按一定体例抄合在一起。这已是较为完整意义上的丛书。其后任昉又有《地记》二百五十二卷，《隋志》说：“梁任昉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以为此记。其所增旧书，并多零失，见存别部行者唯十二家。”任书是陆书的扩大，体例当因而未改。陆、任二书并有辑佚性质。《四库提要》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小序谓陆澄《地理书》、任昉《地记》“是为丛书之祖，然犹一家言也。”意即此二书只是地理类丛书，而非综合性的汇编丛书，性质还比较单一。

北朝也有近似丛书之作。《北史·张深（渊）传》：“永熙中诏孙僧化校比天文书，集甘、石二家《星经》及汉魏以来二十三家星占，集五十五卷。后集诸家撮要，前后所上杂占、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及天文图，合七十五卷。疑其前集五十五卷当为二十五家天文书之类编，近于丛书；至于后集诸家撮要，当属采摘前集各书有关材料而分类排比的类书。

佛教经典的结集，在丛书发展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据佛教典籍记载，释迦灭度后，迦叶、阿难、优波离结集遗教为经、律、论《三藏》。此实为佛典之丛书。佛教传入东土后，结集经典的方法也随之传入。后来经典翻译渐多，僧侣论著也大大增加，需要将散存各处的著作搜集在一起，于是有经藏之编纂。

《大唐内典录》卷四记萧子良钞经四十二部，二百五十三卷，这

已具有结集经藏的性质。结集经藏往往与编定经录同时进行。

《高僧传》卷十一记载僧佑“集经藏既成，使人钞撰要事，为《三藏记》……”。姚名达认为“佛经之有藏，实自佑始”（《中国目录学史·宗教目录篇》）。梁武帝“大崇佛法，于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凡五千四百卷”（《隋书·经籍志》总序）。沙门僧绍、宝唱先后撰集《华林殿众经目录》。虽然僧佑并未抄合为一部，但这种结集，是属于有意识地总括群经，荟萃众书，使其集合在一处，实际上已经开了中国佛藏丛集之先河。

在南北朝后期，作为丛书的佛家经藏正式出现。《广弘明集》卷二二有《北齐三部一切经愿文》，其略曰：“……所以刻檀作绩，构石雕金，遍于万国，尘沙数等。复诏司存，有事缙素。精戒逾于皮骨，句偈尽于龙宫。金口所宣，总勤缮写，各有三部，合若干卷。……”一切经即众经。这段文字反映出北齐曾纂集群经，钞合为三部。这已是正式意义上的丛书。后世佛家经藏大量结集，其体例和方法当真接受南北朝这种初期经藏的影响。谈论中国丛书起源的学者往往忽视佛教僧侣结集经藏对后世丛书编纂的影响，这是不全面的。

这个时期道教亦有结集。据《谷神篇·序》说：“北魏寇谦之尝集道经，为其书少，遂将方伎、符水、医、乐、卜筮、讖纬之书混而为一。”这个说法虽出于后人之口，但道教典籍将诸子、图符、方伎、医药、卜筮之书纳入自己的范围，显然就是结集《道藏》。此前晋宋时期的葛洪、陆修静曾整理过道书，广肆搜罗，当为道藏结集之权舆。

至迟齐梁之世，丛书作为一门新型的文献编纂体例已经出现，并逐渐完善。唯上举各种丛书或准丛书均已亡佚，尚无更多的材料来分析它们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另外，这个时期出现的丛书还基本上是单科丛书。汇纂四部、网络百家的大型综合性丛书的出现还是以后的事。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和道教经藏的原始结集对后

世丛书的成熟的影响。总之，中国丛书的起源应该上溯到魏晋南北朝，而不应该下推到宋代以后。

作者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古籍所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

郑獬《郾溪集》释疑一例

郑獬(1022——1072)，字毅夫，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北)人，著《郾溪集》五十卷，原本久佚，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民国八年，张氏无倦斋重刻文津阁本，后来刊行《湖北先正遗书》，即据张本影印。然此书既经辗转抄录，错讹之处是所不免。如该集卷一四所载《朝贤送陈职方诗序》一文，末云：“集高斋之逸韵，增黄堂之故事，宿承颺授本，辱命冠篇，绝《大雅·穆如》之章，惭末学斐然之累。宝光己卯季冬二十八日序。”宋代绝无“宝光”年号，据字形及郑獬生活年代考之，当是“宝元”之误，且“宝元己卯”正是宝光二年，干支相符。然此文首称“康定元年，尚书外郎陈君以殿中丞出贰福州”，又云“由康定距于今凡十七年”。又，此数语显属骈句，而郑獬却极少作骈文，即便是作制诰，亦多不用骈体(宋代制诰绝大多数为骈体)，为人作序，自然不会一反常态。笔者熟读此数语，于“宿承颺授本”句偶有所悟，考此期有姓胡名宿者，为仁宗朝名臣，亦为骈文高手，有《文恭集》存世。于是翻阅该集，其卷二九《集贤给事俞公送行诗序》一文之末正有此数语，且通篇年代相符，文气贯通，决无疑义，由是可释《郾溪集》之疑矣。

·刁忠民·